

第 21 卷



王蒙文集



第 21 卷

论文学与创作
(上)

人民文学出版社

目 录

综 论

伟大的起点	(3)
作家应有真知灼见和真情实感	(9)
“反真实论”初探	(14)
睁开眼睛面向生活	(20)
领导文艺工作要树立生产观点	(26)
文学与安定团结	(30)
生活、倾向、辩证法和文学	(36)
漫谈文学的对象与功能	(48)
一点感想	(58)
对一些文学观念的探讨	(63)
是一个扯不清的问题吗?	(68)
为了更加成熟的文学	(73)
“人性”断想	(80)
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88)
文学现状断想	(95)
社会进步与道德、审美评价	(102)
读评论文章偶记	(115)
学文偶拾	(129)

理论、生活、学科研究问题札记	(145)
文学三元	(167)
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	(177)
自由与失重	(185)
何必悲观：对一种文学批评逻辑的质疑	(195)
人文精神问题偶感	(208)
沪上思絮录	(219)
随感与遐思	(231)
献疑四记	(238)
献疑札记	(244)
全球化浪潮与文化大国建设	(252)
李瑞环同志《务实求理》中有关思想文化工作的 一些论述	(256)

创 作 论

关于写人物	(265)
创作得失杂说	(268)
短篇小说创作三题	(278)
当你拿起笔..... ..	(286)
关于“意识流”的通信	(312)
短篇小说杂议	(317)
论风格	(323)
谈短篇小说的创作技巧	(330)
漫话小说	(333)
翻与变	(341)
谈触发	(347)
谈创新	(356)
漫话文学创作特性探讨中的一些思想方法问题	(363)

短篇小说优势谈	(378)
创作是一种燃烧	(381)
我看微型小说	(387)
再谈微型小说	(389)
风格散记	(390)
故事的价值	(401)
我不想谈小说	(408)

综 论

伟大的起点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五周年了,编辑同志要我写一点感想。我能说什么呢?“讲话”发表的时候我才在小学学鸡兔同笼的计算方法。我们这一辈是太年轻了,许多历史性的事件都没赶上。黑格尔说过,同样一句话,小孩子与老人接受起来就很不同,老人是运用他毕生经验去理解那一句说话的。年轻人往往不会从一些公认的思想、行动准则里体味更多的东西。我们学习《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得还非常不够。

我常常回忆起解放前读一本书的情形,从来也没有那样激动过。大约是一九四八年的夏天,伪“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正在大搞“肃清匪谍”,地下党的一个同志和我的联系暂时中断,空气沉闷极了。这时,从北大工学院自治会的“六二”图书馆借来了康濯的《我的两家房东》,我一口气读完了,欢喜得流出了眼泪,沉重的心情为之一振。那土改后农村的新生活的图景,那种朴素而清新的力量,使自己仿佛第一次知道大地还会有这样一种面貌,人们还会有这样一种生活,也是第一次知道还有这样的使人奋发的文学……重提旧事,并不是为了对《我的两家房东》做什么谀赞,只想表达在毛主席的文艺方针的指导下,老区的、反映我们的新时代和新人的作品对于一个还处在黑暗的包围中的青年,有多么强大的吸引力。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我们慢慢长大起来,口味也变得“高”了些。当开始看了一两本托尔斯泰、曹雪芹或者萧洛霍夫、法捷耶夫的小说

以后,我们对于当代本国作家的作品就不那么爱看了。我同和自己年纪差不多的朋友们在一起时,对于今天的我国的作品弱点的嘲笑,远比应有的正当的自豪多。

读毛主席的讲话,在严格的要求、批评之中,也让人受到强烈的鼓舞。使“革命文艺更好地协助其他革命工作”“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这是多么豪迈而广阔的任务!契诃夫的《海鸥》里的特里果林^①如果也能听听毛主席的讲话,他的深沉的苦恼不就会被明朗的自信所代替了么?过上百十年,那时候我们的后人如果重新翻开《白毛女》《李有才板话》《王贵与李香香》,也许并不把这些作品摆在多么高的地位,但是他们仍会怀着感激的心情把现在的作家看做备经磨难的新时代的新文学的开路人,延安文艺座谈会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的意义也会更加显著。文学,是不能按月份来计算历史的。

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到现在,过了一段不很短也不算长的时间。我觉得,这十五年或许可以算做伟大的起点。文学事业与其他工作不同,一般的事情在制定了正确的政策、配备了得力的干部之后,就可以较快地做出成绩。而从“讲话”的发表到讲话所提出的任务——创造“为人民大众热烈欢迎的优秀作品”——的实现,还要走长长的路,还需要解决许多问题,以丰富和发展我们的思想。

几年来,我们在击败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讲起新的文学大厦的建筑,还是用“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来形容最合适,“万水千山”都在前面。

建设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文学要比破坏反动文艺困难得多。这首先是因为我们好久以来就处于史无前例的社会大变动的情况下。“在这样巨大的复杂的变化中,人们一方面兴奋地看到了新时代的

① 特里果林是契诃夫的名剧《海鸥》中一个有声望的作家,他的公民责任感常常受到责备,他为自己“只能写写风景”,而写不好“人民,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将来”而十分苦恼。

光明的前景,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会感到这样那样的不习惯,不协调,生疏,不摸底,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人们心理上的七上八下正是这种过渡时期的必然现象。”(以上两段引文均见《人民日报》四月二十三日社论《全党必须认真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解放后许多老作家的搁笔,固是由于教条主义的束缚,也可能还由于思想的动荡:旧的欲去未去,新的该来未来。政治认识也许几个月就可以跃进,感情、趣味的改造就要花费很久的时间,接受“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和根据这一方向写出作品中间的距离也并不短。这里,不是说必须改造完毕才能写作,是说任何严肃的作家绝不会拿出自己已经没有把握的旧东西给读者,更不愿以浅薄的公式图解哗众取宠。

困难还在于,实践毛主席指示的方针,并没有多少现成的经验可以遵循。师承古典大师是要紧的,不仅要学习他们的艺术技巧,而且必须学习他们对真理的探索、对人情的洞悉和对生活的深思(目前,这种精神并不够!有人以为既然党正确地领导着一切,文学就减轻了自己的任务)。但是,建立一种表现工农兵、教育工农兵、为工农兵喜爱的文学,究竟是一种全新的事业。无论我们在《红楼梦》《西厢记》面前如何五体投地和自惭形秽,我们的任务的光荣与艰巨仍然是历代的作家不能比拟的。有人在为了“今不如昔”而着急埋怨,其实,有什么办法呢?作家生在这样一个倒霉(?)的时候,他们流着汗为新时代的新文学打地基,暂时看不见矗立的大厦高楼。

上面说的困难是属于那些努力按照“讲话”指出的方向前进的人们的。有没有人不接受,或者口头上接受、实际上跟这个方向相抵触呢?我想是有的。我自己就一直没有好好地学习过毛主席的讲话,没有警惕那种“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的早已有之的偏向,直到最近……

讲了这么一些创作方面的情况,有什么根据呢?什么根据也没

有。对于自己心爱的朋友,即使音信杳然也愿意对他的生活做出种种猜测,我这里零乱谈到的对于心爱的文学的一些臆断,大概也是这一类的尚可原谅的“主观主义”……

那么就“猜”下去吧。动荡不稳的情况好像并不仅存在于作家方面,谁能说近年来某些对于文艺工作的领导是充分恰当、充分一贯、充分有经验的呢?那篇“人造矛盾”的代表作——小说《结婚》,就曾经被转载在《人民日报》上,而且编者把它当做典范向社会推荐。这其实是提倡公式化、概念化。不过,据说这种做法多少符合当时的“具体条件”……

在文艺问题上,存在着比较多的分歧看法、比较复杂的思想状况,这是可以理解的。大变动时期的互相矛盾的阶级意识,必然会反映到文艺思想上。认识上的各有短长,以及艺术风格、手法、趣味的不同都会造成不一致。文艺本身就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意识形态,任何伟大的理论,多半只能使“方向”取得一致,而不可能精确地概括文艺问题的各个方面,用逻辑思维来解释形象思维,是难以做到面面圆通的。可是,有些人似乎不了解、不同意这种客观状况,以为一切不同思想都是阶级斗争的反映,硬要以方向的一致性抹杀不同的观点、风格、爱好……的存在(其实,方向问题也可以争鸣嘛),我觉得这是教条主义在文艺思想上显得特别突出、特别可悲而且可笑的一个原因。

同时,也有一些不肯下苦功夫学习文艺的人,他们有的甚至宣称自己不懂艺术也不想懂艺术,却想靠背诵“讲话”的片言只字和一般的政治分析能力插手领导文艺。该让这些好心的、靠教条主义吃饭的人歇歇了。

最近,谈教条主义谈得够多了,矛头大部分指着领导和批评家。我想再说说教条主义的“群众性”。我们的社会制度十分优越,我们的人民在各方面日益表现出主人翁的精神,文学作品在今天拥有最多的读者,受到最大的关怀,这都是极好的事。同时,文学第一遭与

群众相结合,除了发生了文学事业不能满足群众需要的问题,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群众对文学的热情关怀、迫切要求,与群众的文学知识、艺术欣赏能力不相适应的现象。今天,确实有一些读者是被教条主义的理论与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培养起来的。有一些担负着各种工作的同志不了解文艺的特点,他们片面地、孤立地把政治标准第一理解为政治标准唯一,又把政治标准理解成能否从作品中抽出几条“主题思想”“教育意义”“模范事迹”。当然,这不能怨读者,《中国青年》上就发表过一篇文章,甲乙丙丁列举了娜斯嘉的若干条优点,让青年读者从《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中学习,在这种杀风景的“指导”下,读文学作品与读团课记录稿有什么两样?我也屡次听到团中央的同志在给青年做报告时攻击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的歌词,说:“你们有人愿意变成一只小羊让人拿鞭子打吗?我反正不愿意。”还有,听说报刊编辑部常常收到一些读者的来稿,他们热衷于给他们看着面生的作品扣大帽子,帽子越大越好。据我了解,有的热心的青年朋友已经把这当做踏上“文坛”的一条捷径,写小说至少得多懂点人生,写这种“批评”只需要学会挥舞棍子。教条主义的危害是多方面的。

创造新的文学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在创作方面、领导方面、社会舆论方面都会碰到困难。当回顾近年来文学的状况时,有些牢牢地掌握着延安文艺座谈会确定的方针做工作的同志,似乎不大去正视我国文学事业严重地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的状况,不去彻底地检查、说明这种状况,害怕“座谈会”后党所领导的文学事业的光辉成就被贬低。也有些为我国的文学事业而忧心忡忡的同志(包括许多读者),他们实际上已经不那么热情地去学习、宣传、实践毛主席的文艺方针了。即使在“争鸣”“齐放”之前,如果不只看报刊上的某些“官样文章”,而且听听文艺界人士的“街谈巷议”,就会知道问题并不那么单纯,想法并不那么一致。其实,正如毛主席所说,“讲话”解决的是“根本方向”的问题,“根本方向”确定了,不等于不朽之作接

踵而至,我们是既不必惶惶然也不可高枕无忧的。新的事物是最有生命力、最有前途的,也不可免地有许多弱点和困难。不论走多少弯路,付出多少代价,“讲话”的精神终将贯彻,文学事业终将取得伟大的成绩。在这四面春风的美好时节,虽然叹息声也时有传来,更多的脸上是挂着衷心的微笑……

1957 年 5 月

作家应有真知灼见和真情实感

好的文学作品往往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一个能动的因素。它不是可有可无的、转瞬即逝的、消极被动的装饰品。《红楼梦》全面地、深刻地展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腐烂和解体。鲁迅的作品推动了“五四”以来的中国人民的觉醒和抗争。《堂吉珂德》抨击了中世纪的荒唐、陋俗。《黑奴吁天录》从思想上准备了美国的解放黑奴的战争……

杰出的作家往往也是大思想家,他们有着那样智慧的头脑、敏锐的神经和沸腾的热情,所以,他们能洞幽烛微,有所发现,有所宣告,表达人民的愿望和历史的要求;他们常常做出正确的预言(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他们的作品常常成为历史运动的前兆。

当然,不是每一个作家和每一部作品都能获得这样巨大的成就。但是,“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如果反过来在某个历史时期,所有的作家都没有这样的勇气、追求和责任感,如果他们满足于奉诏应制,人云亦云,那将是很可悲的情景。

但是,前些年却有一种说法,按照这种说法,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作家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幸福:我们有党来掌舵;我们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罗盘;我们的航线清楚、确定;我们能够而且已经做到了洞察一切,对一切社会生活现象都能做出货真价实、言无二价的准确的解释与明白的结论。有了马列的书、毛主席的书,有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文件,又有了《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我们

将不需要对生活进行独到的探求和思考,不需要别出心裁地去揭示生活的底蕴,不需要艰苦卓绝、奋不顾身地去追求和传播真理。需要我们做的,只是紧跟和照办,重复和图解文件和报刊社论上的现成的结论;只有不加置疑地去重复和图解现成的结论,才证明你是马列主义者,是党的作家,是党性的最高表现。相反,谁如果敢于独立思考、别出心裁,就只能“独立”到马列主义之外,“别出”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的营垒中去……

可惜,这种说法本身就是彻头彻尾的伪马列主义、伪科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真理是一个过程,真理是不能够穷尽的,真理不是解释一切、回答一切生活中的问题的万应灵丹。任何现成的结论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多么“幸福”的人也不能用阅读和背诵现成的结论来代替实践——认识——实践,这一伴随着激情和苦恼、失望和欢乐、疑惑和彻悟的过程,何况是作家呢?鼠目寸光的庸人,看风转舵的市侩,迷信僵化的冬烘,追求自保的甲虫,难道能新的历史时期为人民群众生产出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来吗?难道能为人民群众、特别是为青年读者带来什么新的、有益的东西吗?难道能无愧于我们的伟大的时代吗?

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因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不是某个个别长官的意志,而是无产阶级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所进行的争取全人类解放的历史性的斗争。要学习革命理论,学习文件和报刊社论。因为实践已经证明了革命导师的理论的正确并正在检验着和发展着、丰富着革命的理论,因为文件和报刊社论多数也是来自生活、作用于生活的。我们不是虚无主义者。我们承认实践的权威,故而也能全面地、准确地接受理论——方针——政策的权威。

然而,生活之树是常绿的。我们更要深入生活,观察、研究和感受生活。文学作品贵在独创,没有比似曾相识和看头知尾的作品更倒胃口的了。而独创的前提是发现,发现生活中新的问题、新的萌芽、新的可能性。不但要发现文件和报刊社论中已有的结论下面的

具体事例,而且要善于和勇于发现暂时还没有见诸文件和报刊社论,或者用现成的结论还不能解答透彻的东西。要善于和勇于及时地、艺术地、深思熟虑地和负责地把自己的新发现传达给读者,要努力和读者一道,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来解释和回答新的问题。

如果一时解释和回答得不那么完全,不那么清楚,也不要紧。因为一种生活现象,一种矛盾,都有它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人们的认识也会有一个过程。所谓提出问题而没有解决问题的作品,只要不是冷漠的、不负责任的和敌意的,仍然是有益的,它同样推动人们思索和前进。

以自然现象为例,关于地震的形成和规律,至今仍在研究和讨论之中。但这并不妨碍作家早在古代就生动地描写发生地震的情景。这种描写甚至对自然科学家也是有意义的。同样,社会生活中也有地震,有潮汐,有风浪,有雷电,也有和风细雨。这些社会生活中的地震、潮汐、风浪、雷电与和风细雨,同样会震撼着或者沐浴着作家的心灵,引起强烈的冲动,要去描写它们、再现它们,要抒发人民(包括作家本人)对它们的反应——爱或是恨、惊惧或是振奋……我们怎么能要求作家必须在气象专科学校毕业以后才可以描写气候的变化呢?正确的逻辑思维、理念的判断无疑可以指导作家更正确地、更深刻地运用形象思维去观察和感受生活;反过来,形象思维对逻辑思维也有巨大的反作用,它可以促进、启发、推动逻辑思维,它可以在人民群众运用自己的社会实践去认识、检验和发展真理的万古长青的运动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政治是挂帅的,但是“帅”不可能深入到每一个堡垒、壕沟、阵地,“帅”一般来说更不可能深入敌后。让文艺给我们的“帅”当好侦察兵吧。作家应该自觉地做党的耳目、神经、喉舌,除了人民的利益党再无别的利益。图解长官意志、浮夸的(实际上助长了阿谀之风)歌颂太平、虚假的矛盾(如每篇都有一个走资派或者老地主)、赶浪

头的题材……不但破坏了艺术性,也破坏了思想性,降低和妨碍了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巨大功能,它们已经理所当然地愈来愈受到读者的厌恶与摒弃。人们在打开新书的第一页的时候有权利问作者:“你将告诉我们什么新的东西?带来什么新的体验?提出什么新的问题?用什么样的新的思想的果实来丰富我们?”

我们反对各级领导变成照抄照转的“收发室”,我们也反对作家把自己的创作变成照抄照转再加上进一步图解的功夫的“收发图解室”。我们希望在作品中看到作家的探求、思索、追寻、怀疑、焦虑、呐喊、呼吁、苦恼、喜悦、信念……我们希望从作品中感到作家的体温、头脑、脉搏和灵魂。可惜,某些作品读完后你只能感到一个苍白的躯壳。

我们希望从文学作品中获得更多的精神力量,好的文学作品甚至可以成为人们的精神支柱。不是许多革命先烈吟诵着悲壮的诗句从容走向刑场吗?我们这一批四五十岁的人,年轻时候有几个不曾虔诚而郑重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抄录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上“人最宝贵的是生命……”那一段话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教育了苏联的、中国的、世界的不止一代革命者。特别是当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引起了(远远不仅是在青年中)以“看透论”为代表的虚无主义泛滥的时候,人们多么希望从文学作品中得到新的力量、新的鼓舞、新的支柱啊!当然,靠重复现成的结论、靠粉饰和谎言是得不到这种力量的。因为这样的作品只能说明它的作者从精神上比它的读者更弱,更空虚,只能说明它的作者本身已经丧失了对革命理论、对唯物主义、对社会主义生活的信心。只有严肃而热情地面向生活、正视生活、有所发现、有所探求的作品,才能真正成为读者的精神力量的源泉。

我们还希望从文学作品中获得滋润人们的心灵的甘霖。林彪、“四人帮”搞得人们——特别是青年的心灵好像是大旱后龟裂的土地,心灵的焦渴使一些人变得粗暴。“四人帮”把一切美好的、善良